

目 录

序	丁邦新 (1)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	王福堂 (1)
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	何大安 (11)
历史层次分析的目标与内容	潘悟云 (22)
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	王洪君 (36)
论文白异读	杨秀芳 (81)
语言转换和方言底层	沈钟伟 (106)
语音层次的定义及其鉴定的方法	陈忠敏 (135)
清浊音变圈：自然音变与泛时层次	朱晓农 寸 熙 (166)
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	丁邦新 (187)
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 , 共为不韵”	梅祖麟 (197)
吴语中官话层次分析的方言史价值	郑张尚芳 (219)
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	李如龙 邓享璋 (227)
陕北清涧话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语尾 [· mi] 探源	刘勋宁 (247)
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通摄舒声的历史层次	李 蓝 (258)
论闽方言四等韵的三个层次	吴瑞文 (274)

序

回忆起来,大概是中学时代第一次听说中国话有文白的区别。国文老师说:李白不是 lǐ bái,读书的时候应该读 lǐ bó。我虽然了解,但是我一直还是读 lǐ bái。等到后来走上研究语言学的路,才知道赵元任先生早在 1928 年就已经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说过文白的问题。他说:

文言白话音。在中国好些方言当中有些字读书或“joai 文”时是一种念法,说话时又是一种念法。现在简单用小“文,白”字样注它。什末音有文白两读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子。

“joai 文”的意思就是卖弄学问,国语罗马字的 joai 就是 zhuǎi,可能是“蹶”字。在《现代吴语的研究》记录的方言中,显示声母、韵母、声调都可能有文白不同的读音。这是我所见到的分析文白读音的最早的中文数据。

汉语各方言都有或多或少的文白异读,闽语特别多。1979 年 Jerry Norman(罗杰瑞)发表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一文,已经从闽语方言个别词汇的异读推断闽语有来自秦汉、六朝及晚唐的层次。杨秀芳(1982)研究四个闽南方言的文白系统,指出潮州方言中有三个语言层,并且举例说明厦门、泉州、漳州、潮州四个方言之间语言层的对应关系。陈忠敏(2002)进一步证明吴语跟闽语也有层次的对应。他发现吴语和闽语虞韵字的读法各有三个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彼此对应。

我从 1973 年开始研究儋州村话到 1986 年发表,发现这个方言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字都有文白异读。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文白的声调不同:

	阴平	阳平	上	去	阴入	阳入
白读	35	55	22	11	<u>22</u>	<u>55</u>
文读	22	11	55	35	入	<u>55</u>

文读入声不分阴阳,只有一部分原属阳入的字也读 55 调,也就是这一部分文白读音才有可能相同。文读的调值没有一种出乎白读系统之外的,可见文读音进入儋州话时受到白读音系的调整。从各种音韵条件看起来,文读音和粤语类似;白读音可能是一种早期的客赣语。文白混杂以后又可以产生新的白话音。(丁邦新 1986: 172—175)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何大安(1981)研究海南岛的澄迈方言,指出澄迈方言在普通的文白异读之外,有一个新的文读层,可能来自一种粤方言。杨秀芳(1982)指出潮州方言第三层的文读可能是从官话或粤语移借而来,她的解释如下:

所谓“文读系统”,是一种优势方言进入另一方言之后所造成的。……因文白之间有差距,移借入文读系统时,便产生音韵上的调整,使借入的文读音能纳入本地人原来的系统之中。而文读系统借入之后,在日后的演变上,文白应该有相同的步调,因此若干世代以后,这一个文读系统便与原来的优势语言渐有不同,或者另又兴起别一种优势语言,于是便可能再借入第二套文读音。(1982: 3)

我觉得这个解释合于语言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科举是隋代的事,正好隋仁寿元年(601年)陆法言《切韵》成书。唐代沿袭《切韵》的孙愐的《唐韵》非常盛行。王国维《书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说:

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

相信当时南北两大方言的所谓标准音就随着科举跟韵书而流行(丁邦新 1995),既有实际的需要,又有完整的系统。这些标准音进入大多数

方言就成为文读音。

标准音产生改变,或者以邻近的大城市通行的方言作为标准音,或者民间找不到说标准音的读书人,而从文化较高的城市找来的师傅说某一种方言,这种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声韵各异的文读音,而一千多年以来标准音虽然改变却又总是存在。因此“优势语言”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造成文读音的层次,而读书、科举、官场的需要则成为推波助澜的动力。至于白话音,则因为移民群先后的混杂,也可能造成不同的层次。

其他的语言当然有移民群带来的方言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但是没有一个是具体而又随着时间变化的标准音老是继续发生影响,也就不会有相当完整而又不同的历史层次。汉语中这些层次在语言演变的过程里互相影响磨合,产生种种变异。我觉得这是汉语特有的现象,对这个现象的探索研究将来对语言学理论会有重要的贡献。

大约是 2001 年的秋天或 2002 年的春天,潘悟云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他在我的办公室里提到跟我合作研究方言历史层次的计划,由于上述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跟兴趣,当时立即表示赞成。历史层次比较丰富的方言自然是东南方言,所以就把计划定名为“吴、闽、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2002 年申请到台湾一个学术交流基金会的三年补助,合作单位是香港科技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后来又延长一年,到 2006 年 6 月底结束。

主要的工作共分两方面:

一、为历史层次研究建立工作平台并把吴、闽、客、赣方言的资料做成语料库。

吴、闽、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涉及大量方言的层次分析以及历史比较,如果靠手工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总体思路是把田野调查的材料输入计算机,做好语料库。通过计算机在方言与中古音之间进行历史比较,得出初步的历史层次,然后研究人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研究人员主要调查吴、闽、客、赣方言,并做成数据库。共有以下若干个方言点:

客、赣方言四十五个点:

安远、波阳、崇义、大余、定南、东乡、奉新、抚州、高安、横峰、湖口、吉安、井冈山、乐平、黎川、莲花、临川、龙南、南昌、南城、南丰、南康、南雄珠玑、宁都、萍乡、全南、瑞金、上高、上犹、石城、泰和、铜鼓、万载、新丰、新余、星子、修水、宜春、宜黄、永丰、永修、于都、余江、余干、藻溪。

吴方言四十一个点：

常熟、常州、崇仁、丹阳、海盐、杭州、黄岩、嘉兴、江阴、金华、金坛、景宁、靖江、开化、昆山、黎里、溧阳、龙泉、龙游、罗店、梅县、宁波、蒲门、衢州、盛泽、双林、霜草墩、松江、松阳、苏州、遂昌、太平、童家桥、温州、无锡、宜兴、永康、余姚、云和、周浦、诸暨。

闽方言二十个点：

昌江、澄迈、崇安、定安、东方、福安、福鼎、海口、建阳、乐东、陵水、浦城、庆元山根、琼海、三亚、石陂、寿光、泰顺蛮讲、万宁、文昌。

此外我们还做了平话方言与壮语方言的数据库，作为研究历史层次分析底层时的参考。

平话方言十七个点：

百色那毕、宾阳芦墟、扶绥龙头、富宁剥隘、横县横州、临桂两江、临桂五通、灵川三街、龙州上龙、马山乔利、南宁亭子、宁远清水桥、平乐青龙、融水融水镇、藤县藤城、田东林逢、郁林福绵。

壮语方言三十六个点：

崇左、大兴、德保、东兰、都安、扶绥、广南侬、广南沙、贵港、河池、横县、环江、靖西、来宾、连山、凌乐、柳江、龙胜、龙州、隆安、南丹、宁明、平果、钦州、丘北、融安、上林、上思、田东、田林、文马、武鸣、砚山、宜山、邕北、邕南。

这些材料都已经制成光盘，可以提供给研究方言的人参考。

二、集合研究吴、闽、客、赣方言的专家，举行小型讨论会，深入探讨方言中的层次问题，交换研究心得。

收集材料是为了提供研究的素材，我们召开了小型的研讨会发表论文、交流意见。2003年8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及吴、闽、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工作小组学术研讨会”，2004年8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首届历史层次国际研讨会”，2005年7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二届历史层次国际研讨会”。这三次会议每次参加的

人在二三十左右,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日本、美国的学者。

这本论文集就是前两次会议的成果,会议中发表的文章有许多都没有收入。有的人决定把文章发表在别的地方,有的人答应给文章却没有交卷。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个人退休后反而奔波忙碌,联络不周,所以有好些好文章没有来得及收进来。在编辑的同时,我又想到有些学者没有来参加会议,但是曾经发表过重要的文章,我就个别征求他们的同意,把这些文章也放进来,希望尽可能地给读者比较完整的面貌。

论文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偏重历史层次的理论问题,作比较一般性的探讨;第二部分偏重个别方言中的历史层次问题,直接讨论有关层次的种种关系。当然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本书就叫做“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作为论文集的这篇序已经写得太啰唆,我就省略了介绍各篇的内容。幸好每篇文章之前都有一个提要,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潘悟云先生,由于他的提议才会有这个计划,语料库也完全是他的贡献。在我们开始做这个计划之后,已经有好些论文分别讨论方言中的层次问题,这几年来层次研究成为大家注重的课题,我们也算是做了一点点领头的工作。

丁邦新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于美国金山湾区千石斋

参考文献:

- 陈忠敏 2002 方言间的层次对应——以吴闽语虞韵读音为例,丁邦新、张双庆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73—83。(这篇文章的初稿是1999年6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上发表的。)
- 丁邦新 1986 《儋州村话》,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四。
- 1995 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第6期:414—419。
- 何大安 1981 澄迈方言的文白异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

101—152。

杨秀芳 1982 《闽南语文白系统的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赵元任 1928 《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

Norman, Jerry(罗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第4期:268—273.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

王福堂

(北京大学中文系)

提 要：本文介绍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异源层次、同源层次、底层等现象，提出分析层次构成和判断层次来源的某些方法，并对异源层次和同源层次的鉴别进行探索。

关键词：汉语方言 层次 异源层次 同源层次

—

在汉语方言中，下列现象可能和层次有关：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如北京话陌韵字“伯”有 $\underline{\text{p}}\text{p}o$ $\underline{\text{p}}\text{pai}$ $\underline{\text{e}}\text{pai}$ 不同的韵母和声调；相同的意义有不同的词语，如“鼎”、“镬”、“锅”等；相同的语法功能有不同的句式，如疑问句中的“VP不VP？”和“可VP？”式；等等。以上各例分别属于语音层次、词汇层次和语法层次。这些层次大多由从异方言（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的其他方言）借入的部分和本方言原有的部分叠置而成。

本文讨论语音层次。语音层次具体表现为同一古音来源的字（一个字或一组字）在方言共时语音系统中有不同语音形式的若干音类。有的音类来自异方言，就叫做异源的。比如北京话上引陌韵字“伯”和下列铎韵字：

酪 lau^2

洛 luo^2

络 luo³ lau³

同是陌韵字,韵母有 o、ai 两个语音形式;同是铎韵字,韵母有 o(uo)、au 两个语音形式。陌铎韵字韵母各有两个音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中 o(uo)是异源层次。

汉语方言中,一个字的异读中往往有异源的。这类异读具有不同的风格,并有语音上的对应性,一般称为文白异读。单个字的异读分别称为文读音(或读书音)和白读音(或口语音),如上述北京话铎韵“络”字的 luo³ 为文读音, lau³ 为白读音。多个字语音上有对应的异读形成异读层次,分别称为文读层和白读层,如上述北京话陌铎韵的 o/uo 属文读层, ai/au 属白读层。异源层次一般是其中的文读层,大多是从外方言借入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异读中都有异源层次。比如北京话“慨”k^hai² = k^hai¹ 两读只是本方言中字音的声调分化,不是另从异方言借入读音的结果。又如“离~开”li li² 两读也不是声调的异源层次,而只是同形字“离~开”(力智切)和“离~别”(吕支切)合并的结果。此外,许多语言运用造成的字音变化也不能归为异源层次。比如广州话“纠”^ɿtəu 是偏旁“乚”和“斗”混淆造成的误读,福州话“脚”^ɿk^ha 是同义词“骹”的训读,这类读音和本字并没有关系。

二

底层也是一种异源层次。这种层次比较古老,而且在语音系统中往往有特殊的曲折的表现。底层原是地理学名词,指最深处的地质层次,有时会有露头。语言学借用这一名词,用来指历史上已经被替换掉的语言留下来的痕迹(大多体现为音值特点或个别词汇)。比如浙江庆元话帮端母字声母为 ʔb ʔd,如“布”ʔbu²、“到”ʔdəu²。帮端母浊化并吸气的这种特殊变化是汉语的历史演变不能解释的。但壮侗语声母塞音中双唇音和舌尖音只有浊音,其他部位只有清音,则是普遍的现象。联系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情况来考虑,庆元话双唇和舌尖部位塞音的特殊音值应该是反映了壮侗语的特点。这种音值是早期壮

侗语和吴语接触后遗留下的,目前在庆元话中成了体现壮侗语影响的底层。

有的方言底层的特殊语音形式已经消失,但通过它对语音系统造成的影响可以推知它早先曾经存在。比如湖南临武土话中古浊声母的音值:

婆並 甜定 球群 贱从 斜邪 丈澄 锄崇 乘船 仇禅
 $\underset{\epsilon}{p}u$ $\underset{\epsilon}{t}\bar{i}$ $\underset{\epsilon}{k}^h iou$ $t\underset{\epsilon}{t}^h \bar{i}^p$ $\underset{\epsilon}{t}\underset{\epsilon}{t}^h io$ $\underset{\epsilon}{t}^h aŋ$ $\underset{\epsilon}{t}\underset{\epsilon}{t}^h ye$ $t\underset{\epsilon}{s}^h eŋ^p$ $\underset{\epsilon}{t}\underset{\epsilon}{t}^h iou$

从例字中可见,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中並、定母为 p 、 t ,不送气,其他声母为 k^h 、 ts^h 、 $t\underset{\epsilon}{t}^h$ 等,送气。这些送气和不送气的声母在音值上和一般汉语方言中同类的声母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送气不送气的分化原则却显得特殊,同样不是汉语的历史演变所能解释的。联系上面庆元话帮端母的表现,可以推知,临武土话古浊声母的这种特殊分化也是壮侗语双唇、舌尖部位吸气的浊塞音影响的结果。与庆元话不同的是,临武土话后来又受到古浊声母清化后一律送气的客赣方言的影响,又有了特殊的演变:本来非吸气的其他声母变为送气清音,双唇、舌尖部位的吸气音变为不送气清音。从发音方法来看,吸气音是不可能演变成送气音的。並定母目前虽然已经不是吸气音,但它没有变为送气音,则是因为曾经是吸气音的缘故。因此,临武土话並定母的不送气也体现了壮侗语声母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的表现比较曲折。

三

分析层次可以了解异方言及其语音特点,因而是必要的。分析层次主要是对字音的不同语音形式进行分类,确定文读层和白读层。比如把前述北京话陌铎韵字的层次分为文读层的 $o(uo)$ 和白读层的 ai 、 au 。

层次的区分要包括全部字音。不仅有两读的字要区分文白,只有一读的也要如此。比如上述北京话铎韵字“酪” lau^p 一读是白读,“洛”

luo² 一读是文读。有的字只有一个读音,但可以认为既是白读又是文读。比如山东荣成话:

盘 $\subseteq p^h an$ 文 $\subseteq pan$ 白 伴办 pan^2 拔 $\subseteq pa$

荣成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不分平仄一律不送气。平声字“盘”有文白两读,仄声字“伴办拔”虽然只有一读,但应该认为它们其实也有文白两读,只不过两读相同罢了。所以字音可以有文白两读,即文白异读,也可以只有一个白读或一个文读,还可以兼有文白两读但语音形式相同。

有的方言中字音的文白异读不止两个层次。多层异读往往关系复杂,并可能存在文白转化的现象。比如泉州话豪韵字的一部分文读白读:

文	白	
ɔ	o	暴桃告高
au	o	抱扫牢好
au	ɔ	袍
o	au	草老

au、ɔ、o 三个韵母每一个都可以出现在文读或白读的场所,这对确定它们的身份造成了困难。仅就上面前三组情况来看,文读白读的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 au 只出现在文读场合, o 只出现在白读场合,显然 au 是文读, o 是白读。ɔ 同时出现在文白场合,则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介于 o、au 二者之间的现象,即相对于韵母 o 是文读音,相对于韵母 au 是白读音。即:它们是最早层次 o,次早层次 ɔ,最新层次 au。不过第四组的情况比较费解,因为它和第二组的情况正好相反,彼此矛盾。这第四组情况的出现,应该是方言中字音文白层次在长期使用中趋于杂乱的结果,由此造成了语感中文白区分的困难。

一般说字音中声韵调层次的配合是有规律的:和文读声母配合的韵母也是文读,和白读声母配合的韵母也是白读,等等。比如上海

话“人” ϵn_{17} 白 $\epsilon z_{\partial 7}$ 文,日母三等字声母白读是鼻音 n ,和它配合的韵母是白读的齐齿韵 i_{17} ;文读声母是与由官话借入的音类相对应的 z ,和它配合的韵母是转为开口呼的 ∂_{17} 。又如北京话铎韵字“薄” ϵpau 白 ϵpo 文,两读中韵母区分文白,声母不区分文白。但也可以看成声母文白读音的语音形式相同,所以仍然是白读的声母和白读的韵母配合,文读的声母和文读的韵母配合。

不过有的方言字音中声母韵母和文白层次的配合并不严格。比如厦门话“知” $\epsilon tsai$ 白 ϵti 文 $ti^?$ 文三个读音中,声母 t 是白读, ts 是文读,韵母 ai 是白读, i 是文读。但在配合中,“知”的前一个读音是声文韵白,后两个读音是声白韵文,声母韵母之间文白的配合不一致。这几个读音应该不是本方言原有的,而是异方言的音类借入后与本方言的音类配合的结果。比如借入的韵母 i 和本方言的声母 t 配合为 ti ,借入的声母 ts 和本方言的韵母 ai 配合为 $tsai$ 。这是因为本方言声母韵母有多个层次,而层次的区别在长期的使用中已经杂乱,所以异方言音类和本方言音类的配合在文白层次上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厦门话的“知”应该曾经存在声母韵母和文白层次严格配合的读音,比如 tai 和 tsi ,但目前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现象说明,在有的方言中,不能认为方言字音中声母是白读的韵母一定也是白读,声母是文读的韵母一定也是文读,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四

语音层次有本方言原有的,有由异方言借入的,所以通常说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中可能存在异源或异质的成分。在语音层次中初步分清借自异方言的文读层和本方言原有的白读层以后,还需要了解其中异源层次的来源。异源层次的来源一般可以根据语音形式本身来判断。比如前述上海话“人” ϵn_{17} 白 $\epsilon z_{\partial 7}$ 文,可以根据日母字在吴方言口语词中声母为 n ,在官话中声母大多为 z 或 z_1 ,把声母 n 确定为吴方言本身的层次,归入白读层,把 z 确定为来自官话的层次,归入文读层。

有的方言还可以借助文献材料来判断层次的来源。比如安徽休

宁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分送气不送气两类,分化并没有语音条件。以定母字为例:

te² 题提蹄 ≠ t^he² 啼
 to² 弹 ≠ t^ho² 檀坛
 tiəu² 投 ≠ t^hiəu² 头
 ti:ɛ² 填 ≠ t^hi:ɛ² 田
 too² 堂堂唐塘 ≠ t^hoo² 糖
 ta² 腾誊 ≠ t^ha² 藤
 tæŋ² 铜桐筒童瞳 ≠ t^hæŋ² 同

各行不等号前后的字在中古韵书中属于同一小韵,原是同音字,而目前却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一个历史记载提供了这一声母分化的线索。根据清江永《榕村等韵辨疑正误》所记,三百年前婺源东郊方言和休宁话的古浊声母都是清化不送气的,西郊的方言直到饶州(今江西省赣方言区)都是清化送气的。清化送气体现了赣方言的特点。因此可以说,目前休宁话一部分古浊声母字清化送气应该是那时以来赣方言影响扩大的结果,属异源层次。

有的方言缺乏文献材料来帮助判断层次的来源,则可以借助和邻近方言的比较。比如建瓯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也分送气不送气两类,也没有语音条件可以说明。如下列並(奉)母字“肥”、“瓶”、“皮”和定(澄)母字“茶”、“铜”、“啼”,每一组第三字的送气声母,可以根据历史文献中唐以后中原移民经江西大量进入闽地的记载,判断是由客赣方言借入的。而前两字声母的不送气,似乎都反映了本方言原有的读音。但如果把建瓯话和邻近的建阳话、石陂话相比较,就会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肥	瓶	皮	茶	铜	啼
建瓯	py ²	ɿpaiŋ	p ^h ye ²	ta ²	ɿtoŋ	t ^h i ²
建阳	ɿpy	ɿvaiŋ	ɿp ^h u	ɿta	ɿloŋ	ɿhie
石陂	py ²	ɿbeŋ	p ^h o ²	ta ²	ɿdəŋ	t ^h ie ²

以上並定母两组古浊字中,建瓯话不送气的“肥”、“茶”二字,建阳话、石陂话也不送气,“瓶”、“铜”二字,则建阳话声母为浊擦音和边音,石陂话声母为浊塞音。“瓶”、“铜”二字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吴方言影响的反映,只是在三个方言中反映程度有所不同。由此推断,建瓯话古浊声母的不送气音来源并不单一,“肥”、“茶”的声母固然为闽方言原有,“瓶”、“铜”的声母却来自吴方言。

五

如前所述,由异方言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原有的音类构成叠置。但方言中还有因本方言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

首先,这后一种音类叠置主要和“词汇扩散”式的音变有关。比如目前北京话零声母 uei 韵母阳平字向阴平调的演变,采取一部分字一部分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扩散式音变。如①围为桅②唯惟维违③危微微巍等字,其中①还没有变化,仍读阳平调,②已经开始变化,读阴平调阳平调两可,③已经完成变化,只读阴平调,不再读阳平调。这种方式的演变将会使所有的 uei 韵母阳平字都变成阴平字。不过这种音变也有一种可能的结果,即个别还没有变化的字音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再进入变化的行列,最终作为旧音类的残余遗留了下来,和已经变化了的新音类构成叠置。其次,个别字音如果和字形分离,语音上也可能会脱离音类主流的变化而成为残余形式。比如闽方言中效摄开口三等韵目前主要的语音形式是齐齿韵,但干燥义的“焦”字在福州话、厦门话中读音为_ɛta,韵母为开口韵 a。(另“猫”字也为 a 韵母,如福州话_ɛma,厦门话_ɛba。但根据建瓯话该字的读音 me²,应该认为是一个二等字,不属三等。)(《说文》:“焦,火伤也。”原指物因火变质变色。但在“焦”义转为干燥后_ɛta 音就和字形分离开来,人们一般都用同义词“干”作为书写形式。于是这个不再被认为是“焦”的字音_ɛta 就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残存形式,和效摄开口三等字主流的齐齿韵的语音形式构成叠置。第三,个别字音的特殊变化也有可能生成新的语音形式。比如北京话“谁”_ɛsuei 在上一个世纪产生新的读音_ɛsei 以后,两个韵母也构成了叠置。以上因本方言演变而构成的

音类叠置,和因借入异方言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形式上是一样的。这样看来,如果说因异方言音类进入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叫做层次,那么因为方言自身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同样也可以叫做层次。由于后者两个语音形式反映的是同源音类的历时差异,可以把它叫做同源层次,和异源层次相对。

六

异源层次和同源层次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内部的音类一属异质,一属同质。但由于它们在语音形式上可以相同,区分就存在困难。这就需要考虑使用语音的和非语音的多种手段。

首先从语音上考虑。同源层次中的新音类是旧音类演变的结果,而演变应该是可以用音理来说明的。这里把语音变化的过程看成是一个环环相接的链,那么旧的语音形式总是这个音链的上环,新的语音形式总是这个音链的下环,二者的位置不会倒置。比如北京话“嫩”的两读 $nuən^p \sim nən^p$, $nuən^p$ 是旧的语音形式,其中的介音 u 由于舌位偏前的声母和韵尾的共同影响而失落,就变成了新的语音形式 $nən^p$ 。就北京话来说,不能反过来假设 $nuən^p$ 是由 $nən^p$ 变成的,因为说 $nən^p$ 衍生出一个介音 u 是没有任何音理上的根据的。(不过厦门话中古开口字“尘” $ɛt^h un$ 却在同一语音条件下由开口韵转为合口韵,说明汉语方言中的语音变化不都是由发音机制决定的。)

但在异源层次中,由异方言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原有的音类彼此间没有演变和生成的关系,因此它们中哪一个是音链中的上环,要根据两个方言中该音类演变的速度来决定。如果异方言演变快,则本方言音类是音链中的上环;如果本方言演变快,则异方言音类是音链中的上环。前者如上海话奉母字“肥” $ɛ bi$ 白 $ɛ vi$ 文,本方言的白读声母为双唇音 b ,由官话借入的音类折合成的是唇齿音 v ,唇齿音是由双唇音演变来的,所以白读音是音链中的上环。后者如双峰话溪母字“口” $ɕt^h ie$ 白 $ɕk^h e$ 文,流摄开口一等韵声母在官话中是舌根音,而本方言中因为韵母中前元音的影响而由早先的舌根音腭化成了舌面前音,所以文读音是音链中的上环。上面说过,同源层次中旧的语音形式总是演

变慢的一方,因此,凡音类演变快的异源层次都不难和它相区别。但音类演变慢的异源层次则可能很难和同源层次相区别,因为本方言的旧语音形式和异方言音类都是音链中的上环,情况相似。这就需要寻求除语音以外的其他条件来帮助区分两种层次。下面以苏州话歌韵字为例:

əu	驼搓歌
ɒ	他哪那
əu 文 ɒ 白	多拖
əu 文 i 白	左
ɒ 文 əu 白	大

韵母中共有 əu、i、ɒ 三个语音形式,但文白的配合并不单纯。i 只见于白读。əu 有时单独出现,有时是与 ɒ 或 i 交替的文读,有时是与 ɒ 交替的白读,看来也像是一个被新文读推挤的旧文读。即:白读 i,旧文读 əu,新文读 ɒ。但韵母同样为 ɒ 的“多”、“拖”和“大”则文白情况相反,成为矛盾。从词语来看,ɒ 韵母实际上应当分为两类:“多~呢”、“拖~箱子”的读音是口语中旧有的白读,“大伟~”和“他哪那”等的读音本地口语不用,只见于书面语,应为新起的文读。ɒ 韵母的这种或文或白并不是其他韵母推挤的结果,而是借入异方言字音造成的。这样,歌韵字的三个语音形式就应当分成四个层次:əu、i、ɒ 白、ɒ 文。就苏州话歌韵字中古以后的历史演变来看,韵母曾经经历过一个高化的过程,其中 əu 是这一演变的结果,白读 ɒ 是旧语音形式的残留,白读 i 是原读 ɒ 韵母的某些字后来衍生出 i 介音再变化的结果,文读 ɒ 则是由官话借入的。这样,ɒ 白、i、əu 应该属于同源层次,ɒ 文属于异源层次。其中 ɒ 白和 ɒ 文(ɒ 文在官话中其实也是旧语音形式的残余)语音形式相同,但由于文白的差异,得到了区分。综上所述,苏州话的歌韵字的层次就应为:ɒ 白 1、i 白 1—2、əu 白 2、ɒ 文。

汉语方言中层次形成的时间早晚不尽相同。就总体情况来看,官话是汉语方言中去古最远的,所以官话在近代现代对东南诸方言影响造成的异源层次,容易和这些方言中的同源层次相区别。而东南诸方

言相对来说存古较多,相互间的影响也发生较早,因而不少方言,特别是闽方言中层次多而复杂。在这些方言中,如果两种层次和文白的联系不够清晰,判断相互间的区别就将更为困难。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
- 丁邦新 1998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 1996 《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王福堂 1999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
- 王洪君 1992 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商务印书馆。
- 王士元 2000 《语言的探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